

论文提要

中国民俗学会 2012 年年会

主办：中国民俗学会

内蒙古师范大学

承办：赤峰学院

2012 年 8 月 3-7 日 | 内蒙古·赤峰

中国民俗学会 2012 年年会

论文提要

阿布力米提·买买提：维吾尔麦西莱甫的多重文化特征和社会功能

走进新疆，没有一个维吾尔人不知道麦西莱甫，没有一个维吾尔人一生中没参与过麦西莱甫。这种融歌、舞、乐等于一体的群众性娱乐活动，对于维吾尔人来说就像空气、水和盐一样，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正像年迈的麦西来甫一人所说：“麦西来甫传统是我们生活、生命的盐。我们在摇篮时就会就着麦西莱甫音乐跳舞了，小时候跳、年轻失调、年纪大了还要跳，悲伤时跳、劳动累时跳高兴时更要跳，我们生命的活力在麦西莱甫舞里，在麦西莱甫里。”在麦西莱甫中，维吾尔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维吾尔族麦西莱甫是新疆维吾尔族民间特有的、集歌唱、音乐、舞蹈、游戏于一体的传统民俗艺术活动，广泛流传于天山南北的维吾尔民间，已成为维吾尔族群体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习俗。维吾尔族的麦西莱甫经过多年从未间断的传承，加之各个地域的维吾尔族群众创造性地努力，其形式越来越丰富，风格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特别是内涵逐步完善，具备了十分重要的民俗社会功能。在所有的维吾尔族聚居区，在麦西来甫的活动都往往可以实现社会协调的功能，同时可以让族群所有的人，特别是少年儿童学到丰富的知识技能、塑造人格、养成道德和守法意识。因此，维吾尔族的麦西莱甫完全可以说是维吾尔族的非正式的民俗学校。

【作者简介】阿布力米提·买买提（1957～ ）男，维吾尔族，新疆巴楚县人。新疆喀什师范学院人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俗学、民间文学

艾兰：广西少数民族背带的艺术特征与民俗文化

背带，古称“襁褓”，又称“背儿带”、“娃崽背带”或“背扇”，是背负婴儿所用的布兜。背带被喻为背上的摇篮，是世代相传的育婴工具和民间工艺品，至今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还广泛流传。依照部位的不同，背带由背带心、背带盖、骑片以及背带带组成，并根据使用的时宜分为日用和节庆两种，居家或赶场用的背带简洁朴素，无花或少花，以耐洗的材质为主；节庆用的背儿带，则做工讲究且花样精美。背带的设计堪称得上是一件传世的杰作，是简洁、实用和艺术美感的高度统一，具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和艺术价值。小小背带反映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内涵和对美的追求，凝结了这个民族的智慧与精神力量。广西各民族由于居住环境、历史文化等不同，背带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不尽相同，形成了风格各异、

多姿多彩的背带艺术。本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试图从背带的形制、纹样、色彩、工艺、习俗、内涵寓意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广西少数民族背带的艺术特征和民俗文化。希望通过研究少数民族背带这一个侧面，可以加深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理解，进而提高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视，促进对少数民族文化宝贵财富的开发、保护与传承。

【作者简介】艾兰，女，2008 年取得硕士学位，目前就职于广西民族博物馆，从事陈列展览和民族文化研究工作。

安德明：1970 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成就、困境与挑战

从 1970 年代末到现在的 30 多年，是中国民俗学近百年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民俗学逐步矫正此前 20 多年间由于极左政治意识形态的过多干预而造成的严重不足，通过恢复文化大革命（1966-1976）以前、特别是 1949 年社会主义中国成立之前的学术传统得到了重建，继而获得巨大发展。该学科不仅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了诸多新的成绩，对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和公共领域也做出了新的贡献，尤其以它所推动和积极参与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影响深远。但同时，它在理论探讨、学术实践和学科定位等方面，也日益突显出了许多深层的内部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属于中国民俗学所独有，有的则是世界范围民俗学的通病；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中国学者的任务，也是世界民俗学同行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

【作者简介】安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安琪：文本、情境与象征——“神话-仪式”视野下的傣族泼水节传说

泼水节是东南亚和中国傣/泰人群的共同节日，时间大致在公历四月中旬，傣语称为“京比迈”或“桑罕比迈”。与节日紧密依附的泼水节神话不只是对宇宙、自然、文化和社会制度提供原型和起源性描述的一套诠释系统，也是一套地域性的民俗操作系统，与仪式践行相辅而相成。在整体文化体系中，泼水节的“节庆神话”构成了一个融合“文本”与“情境”的杂糅体。以“象征”为途径介入二者的关联之中，能更好地从全局上理解和阐释神话的社会特性，并由此考察庆典仪式的原初意义与核心功能。象征分析为解释“傣历新年”与泼水民俗之间为何会形成必然的结构性关联提供了另一条路径。

【作者简介】安琪，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领域：艺术人类学，西南民族研究

敖其：试论蒙古服饰文化的地域特征——以鄂尔多斯为例

“鄂尔多斯”是蒙古语宫帐——“斡耳朵”的复数形式，这里的斡耳朵专指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作为部名表示“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属民”。成吉思汗去世后，四大斡耳朵及其属民依旧存在，蒙古汗廷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元代，忽必烈长孙甘麻刺受封晋王，统漠北军民并管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后亦成为成吉思汗陵所在之地。

16 世纪中叶，鄂尔多斯等右翼三万户的牧地开始稳定在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最初，三万户一

同游牧，冬居河套，夏天出套向北，分散住牧于大青山、阴山以北地区。清朝时期为防喀尔喀部南进，将四子、茂明安、乌拉特等部迁到阴山南北，自此，鄂尔多斯各部便居住于现今的鄂尔多斯地区。

由于鄂尔多斯独特的历史足迹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其服饰具有与蒙古族其他地区不同的独特的特征。

- 一、鄂尔多斯服饰既保留了宫廷服饰高贵与华丽的气质。
- 二、体现了成吉思汗陵守护者独有的庄重与素雅的风格。
- 三、融入了中原服饰文化的部分元素。

【作者简介】敖其：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毕雪飞：日本民间传承中的七夕传说研究

羽衣仙女故事类型，在世界各地有悠久的传承历史和广阔的流布空间，多年来一直受国内外民间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流传在日本的七夕传说，是羽衣型故事的一种体现，具有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又包含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成果，从日本民俗学草创之初就倍受重视。在田野作业的基础上，从最初的记录整理到故事类型和构造研究，再到故事的传播和地域研究，包含七夕传说在内的日本羽衣故事的研究过程实际上反映了日本民间口头传承研究的一个发展历程。

【作者简介】毕雪飞，女，博士，浙江农林大学日语系副教授、系主任。

蔡磊：手艺的村庄——房山沿村荆编考察

本文尝试在村落生活语境中考察京郊沿村的荆条编织手艺。沿村荆编业兴起依赖房山一带丰富的荆条资源和明清以来的矿业发展，临近集镇的区位优势为荆编销售提供了便利。荆编是沿村人共享的手艺传统和交往纽带，相同荆编劳作模式为沿村人带来共同的信仰、知识、话语体系和地方感，增强了村落共同体的内聚。

【作者简介】蔡磊，女，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陈岗龙：谈蒙古民俗辞典

民俗辞典是蒙古民俗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础性的重要工具书。迄今为止，国内外出版的各种蒙古民俗辞典为各层次的读者了解蒙古民俗和研究蒙古民俗提供了许多便利。同时，这些民俗辞典的编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蒙古民俗学研究的成果。

其实，从第一部蒙古民俗志著作——罗布桑却丹的《蒙古风俗鉴》开始，蒙古民俗的记录和研究就形成了分类记述的基本模式，而且民俗事项的记录和解释也基本上采取了词条的形式。这方面的著作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科尔沁风俗志》（呼日勒巴特、乌仁其木格编著）、《卫拉特风俗志》（纳·巴生编著）、《苏尼特风俗志》（达·查干编著）、《乌珠穆沁风俗志》（富荣嘎、拉·阿木尔门德编著）、《巴林风俗志》（纳·宝音贺西格编著）、《乌拉特风俗志》（纳日苏、阿拉木斯编著）等内蒙古各地蒙古族风俗志丛书和那木吉拉著四卷本《卫拉特蒙古民俗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等，基本上都遵循民俗分类和

词条解释的模式。这些著作也为普及型的民俗辞典的编撰提供了地方民俗的基本材料。

在分类记述、词条解释型各地民俗志著作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小型实用性民俗辞典。如斯仁鹏苏格、吉·哈登巴特尔搜集整理的《鄂尔多斯蒙古传统用具》（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0 年）就分生活用具、服饰、马具、驼具、生产用具、狩猎工具、庆典用具、游戏玩具、度量衡、文具、刑罚用具、医药器械、祭祀用具，图文并茂地简略介绍了鄂尔多斯蒙古民俗用品。而以词条解释蒙古族传统生活民俗的一些辞典则更接近了专业辞书的体例。这方面可以举出两部辞书：巴·旺吉乐编著的《青色的灯盏——蒙古族习俗辞典》（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1 年）和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蒙古与佛教、藏学研究所编著的《布里亚特人的传统民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翻译出版），对蒙古语中的相关民俗词汇做了解释。这类辞典对民俗词汇的解释比一般的蒙古语辞典详细而精确，但是没有对词汇所指示的民俗事项做进一步的专业阐释。

而专业的民俗学家编撰的蒙古民俗辞典则是 20 世纪末开始出现。有三部代表性辞典：1. 蒙古国学者编撰的《蒙古风俗解释辞典》（小、中、大三卷），按照民俗分类对各类民俗事项做了比较详细的专业解释，实用性很强。2. 布林特古斯先生主编的《蒙古民俗百科全书》（经济卷、精神卷，内蒙古科技出版社）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出版的最全面的大型蒙古民俗百科全书，中蒙两国几百位学者参加词条的编写，无论收入的词条还是民俗内容都是空前的，真正做到了百科全书，而且充分展示了蒙古民俗的丰富内容。3. 扎格尔教授主编的《蒙古学百科全书·民俗卷》可以说是近年来蒙古民俗辞典的集大成者，因为有了布林特古斯主编的《蒙古民俗百科全书》，所以《蒙古学百科全书·民俗卷》的词条和解释主要侧重在蒙古民俗事项的简明扼要的概括说明和蒙古民俗学研究成果与学术机构的梳理和评价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蒙古族民俗学事业的发展，集中展示了蒙古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如果说，布林特古斯主编的《蒙古民俗百科全书》致力于蒙古民俗事项的详尽记述和详细阐释，那么扎格尔主编的《蒙古学百科全书·民俗卷》则用功于蒙古民俗学学科发展和研究成果的梳理以及用民俗学理论简明扼要地阐释蒙古民俗事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蒙古民俗辞典比较充分地展示了蒙古民俗的博大精深和集中反映了蒙古民俗学的研究水平，但是因为语言的关系，这些大型民俗学辞典还没有进入非蒙古语读者和学者的视野，因此需要组织翻译人才将其精确翻译成汉语和其他语言，以便促进蒙古民俗学与国际民俗学界的接轨和学术对话。

【作者简介】陈岗龙，蒙古族，1970 年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俗学博士。主要从事蒙古学和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与教学。著有《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蟒古思故事论》、《草尖上的文明》、《东方民间文学概论》等著作。

陈桂炳：福建泉州的“相擗”习俗

“相擗”为闽南方言，又称“掷石”、“斗石”、“石战”等。本文为笔者在福建泉州沿海地区民俗调查所获得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借本次参加年会机会，向方家请教。

泉州沿海各地的“相擗”习俗，在表现形式上都差不多，但在具体内容上则有所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掷石（擗石）战和掷火（擗火）战两种。其中有掷石战习俗的地方较多，曾见于惠安、晋江、石狮等沿海地区，较为独特的掷火战习俗，仅见于晋江东石。

泉州沿海各地的“相擗”习俗，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尚很盛行。新中国成立后，即因被认为是陋俗而迅速消失，但其影响仍存在于民间。

“掷石战”习俗在日本、朝鲜等东亚各国的历史上亦均存在过，只不过叫法不一。泉州“相擗”习俗的学术价值，可侧重于比较研究方面。

国外学者关于其“石战戏”习俗盛行原因的见解，难以完全套用在泉州沿海地区“相擗”习俗的

解释上，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陈桂炳，教授，现任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泉州师院闽南文化生态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区域历史与民俗。

陈华文 陈淑君： 丧葬纸扎与另一个世界信仰——以浙江丧葬纸扎为例

纸扎是一种盛行于生活之中的手工制成品，丧葬纸扎是专门为丧葬仪式及信仰、祭礼过程而制作的手工制成品。从丧葬纸扎诞生之日起，它就与丧葬文化，尤其是丧俗信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活着的人完成将亲人送往另一个世界最重要的象征物和现实生活中最重要的“实用性替代物”。因此，丧葬纸扎不仅支撑了一种信仰，而且建构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与现实世界具有相似性但又存在着差异的世界，从中让我们读出灵魂不死和另一个世界同样存在的不平等。论文从随葬、殉葬与烧化的丧葬文化切入，论述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尤其是烧化死者生前遗物的文化，为丧葬纸扎的盛行，最主要的是为两个世界进行转换的信仰找到了逻辑上的支撑点。论文分类了丧葬纸扎的类别和不同类别的一些具体形态，这些形态大都在今天的现实丧俗中还存在，有的则相当盛行，证明人们对于另一个世界的期待和信仰，有着坚实的民间基础和广泛的社会认同。最后，论文在丰富的丧葬纸扎实物和习俗信仰的基础上，读出了丧葬纸扎所具有的另一个世界存在的意义：即从丧葬纸扎读出了灵魂不死——不仅在丧葬过程，还在祭祀过程，目的就是取悦或获得死者灵魂的护佑；从丧葬纸扎读出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亲人在另一个世界的存在需要这个世界的亲人的协助，丧葬纸扎就是这种协助的重要象征，人们通过烧化完成转换，从而送往另一个世界；从丧葬纸扎读出了阴间的不平等——有钱人的纸扎可以非常气派，“最近这几年流行的“小姐”、“菲佣”、奔驰、宝马、别墅、飞机等纸扎，我们可以读出阴间世界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

【作者简介】陈华文，1959-，男，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主任，浙江省民俗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陈淑君，1965-，女，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陈金文：越南传统佳话中的中国因素

就越南传统佳话而言，其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大概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故事往往涉及中国历史人物；二、常常通过一些汉字的音同义不同做文章或通过对汉字的拆解演绎故事；三、故事有时涉及中国儒家经典；四、一些佳话可看做中国某一故事在越南的流传或中国某一典型故事类型的异文。本人认为，“血统相通，文化相同”，正是越南民间文化打下中国文化烙印的最根本原因。仅就文字的使用来讲，宋代之前，越南文人一直使用汉字创作诗文。到了十二世纪后，越南人才运用汉字及“象形、指事、形声、会意”等汉字造字法则，创制了“喃字”（越汉字），用以记录越语语音，但是，之后仍有不少越南人习惯于使用汉字写作，譬如胡志明就曾使用汉文创作了不少诗歌。由此便可知中越两国是如何“文化相同”的。总之，中国文化对越南文化的强势影响有两千多年之久。正是由于中越两国这种文化上的亲缘关系，才使越南文化（包括民间文化在内）处处表现来自中国的影响。

【作者简介】陈金文，男，汉族，1963年生，山东鱼台人，广西民族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民间文学；出版专著：《孔子传说的文化审美研究》、《壮族风物传说的文化研究》。

陈丽琴：壮族服饰与生态环境

每一地域的民族艺术都与特定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壮族传统服饰也不例外，它的生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壮族的生态环境。自然环境对壮族服饰的原料、颜色、款式及其装饰图案等产生了重大影响，造就了壮族服饰的独特风格。除了自然环境，文化环境也深刻地影响了壮族服饰，政治、经济以及年节习俗、宗教信仰、人生礼仪、交际活动等民俗文化都与壮族服饰密不可分，它们直接制约和影响了壮族服饰的衍生与传承。

【作者简介】陈丽琴，女，壮族，广西大新人，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学军：旅游人类学视野下的赫哲族伊玛堪传承调查

在对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敖其赫哲族村实地调研基础上，应用案例研究与参与观察等方法介绍了在旅游业推动下，政府、企业和民间人士各种社会力量交叉叠合对伊玛堪文化传承的影响，对敖其村的伊玛堪文化传统变迁和再造的过程及其影响要素作了相对系统的分析，探索伊玛堪今后的发展方向，并就如何有效保护提出了具体建议。

【作者简介】陈学军，男，湖北孝感人。佳木斯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师。对民俗旅游、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比较感兴趣。

陈映婕：国家的遗产与学者的民俗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俗学学术本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动力并非来自基层公民社会，也并不具备学术研究的基本特色，其本质上属于国家政治的范畴。它通过各级行政机构自上而下地进行常态运作，其中出现一个精英共谋、各类资本运作的复杂过程与结果。国家的“遗产”与学者的“民俗”有着各自迥异的内涵与外延，它们仅仅是在偶然情形下产生了有限的交集。在“非遗”保护的权力结构中，极易出现学术意义上的价值论恭身屈从于政治意义上的价值标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行政特色，决定了以此去实现民俗学学科自身的内部增长和快速强大，是难以行得通的。大多数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并未偏离学科本位研究，“非遗”对他们而言至多只是兼职的“生意”，不构成常态式的重点研究。学人们要想在“非遗”保护中真正有所作为，依然需要坚持基础性的资料积累和田野作业，保持学术独立书写；向建设公众（应用）民俗学的分支学科方向努力；不偏离民俗学研究本位，关注“传统再发明”的时代议题。

【作者简介】陈映婕，女，浙江杭州人，汉族，浙江师范大学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民俗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村落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藏学等。

陈志勤：重构村落公共性——三门源村水资源利用的过去与现在

浙江省龙游县的三门源村世代居住着叶氏和翁氏两大宗族，他们和睦相处成为一个村落的整体，曾经存在过的在宗族、村落共同体背景下的传统的水利用体系，说明其在私人权益基础上的对保障村落整体利益的义务和责任，有助于我们思考现代社会“公”与“共”的关系模糊以及“公”与“私”的关系对立而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但是，伴随着社会的变化以及生活的改善，传统的水利用共同体解体而消失，并出现了水源枯竭和水质污染等环境问题，村民们希望利用水资源开发旅游的愿望也遭遇了严峻的现实。而同时，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旅游文化开发的背景下，当作为水利资源的“水”被发现也是旅游资源的“水”的时候，呈现出重构水利用共同体和现代村落公共性的可能性。而其中所反映的在新的社会时期村落再生产的过程，或可为环境(生态)民俗学甚至民俗学整体带来新的研究契机。因为在传统村落的基础上进行现代村落再生产以及构建现代城乡关系的时代已经到来。

通过考察三门源村水利用公共性其解体和重构的过程，揭示曾经存在过的宗族、村落共同体背景下的传统水利用之体系，阐明现在因为旅游开发而引起的新的水利用之现状，并以此探讨村落公共性的重构问题，进而提出因为传统村落衰落面临民俗学危机的现在，在今后有必要关注现代村落再生产的过程，在重新审视农村新的意义的基础上，把村落的变化作为民俗学的一种契机来把握。

【作者简介】陈志勤，女，名古屋大学史学地理学硕士、学术博士(Ph. D)，日本学术振兴会博士后并东京大学访问学者(2006-2008)，现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程波涛：《刘海戏金蟾》图像的文化寓意与民俗功用阐释

“刘海戏金蟾”是民间信仰习俗在艺术中的反映，具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价值。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刘海戏金蟾”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寓意和民俗功用，反映了民众求财祈福等多方面的心理需求和世俗愿望。

【作者简介】程波涛，安徽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程宜：广府搭棚艺术

广府搭棚艺术是广府传统建筑技术的分支，它是以竹木为原料，搭建编织精美，几乎瞬间完成的临时性建筑，具有明显的审美和仪式功能。常见的棚架分双行竹棚架、外伸桁架式竹棚架和招牌竹棚架三类。而今被称为搭棚艺术的戏棚、牌楼、神诞醮楼之类的立体棚架就是在上述棚架搭建方式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搭棚相传起源于有巢氏树上筑巢建屋的技术，历史悠久。据广东佛山得名传说，可知佛山早在东晋已经搭棚讲经。搭棚业从搭建遮风挡雨的实用建筑成为一门建筑艺术，大约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在清末民国时期，由于风气使然，搭建彩棚的艺术性得到极大彰显，形成搭棚艺术的高峰期。

广府搭棚行会组织分东家行(资方)和西家行(劳方)。劳资双方共同祀奉祖师爷“有巢氏”，各自制定并遵守自己的行规。搭棚业的劳动者大多来自肇庆、高要农村，也有部分来自增城、番禺和江村。搭棚业发达的广州、佛山、顺德、东莞、港澳等地，为周边地区过剩劳动力提供了谋生的机会。由于广府有浓郁的崇神敬巫传统，各种信仰活动此起彼伏，终年不断，这些活动，往往都会搭建宏伟的彩棚。

如果说搭棚在实用的基础上,结合艺术元素的历史有四五百年,那么,搭棚在今天,可能真正开始进入到独立的艺术创作阶段。有一支以艺术家和建筑设计师构成的搭棚者,他们利用传统搭棚工艺,将当代艺术理念融入其中,借以表达当代人对传统的理解,对当代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的思考,大大延伸了搭棚艺术的精神性和艺术性。搭棚艺术完成了从传统到当代的延伸,成为具有历史意义、民俗意义和象征意义的多维度的艺术形式。

【作者简介】程宜,女,汉族,佛山市博物馆副研究员,陈列宣教部主任。所学专业为美术设计和美术学,长期从事广东地方民俗、艺术研究。

崔家田：从消遣到反思：民俗课程教学改革手记

高校民俗类课程应该进行以“面向现实,面向生活,关涉人心”的课程改革,勇于介入生活与现实,以改变以往知识化的照本宣科或者猎奇消遣的课程定位,实现由“消遣”到“反思”的定位转变,并以智识性为追求,构建全新的知识体系框架,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参与体验型课堂,以增进学生对“生活世界”的理解与关注。同时,在现有课程体系中也应进一步加强并提升民俗类课程的地位。

民俗类公选与专业选修课程,乃至公选课事实上多是被学生作为一种“消遣”性质的活动来参加的。因而,针对上述学生实际心态,应首先阐明民俗课程的设置目的及实际功用,以免学生继续固守己见,以讹传讹,自以为是,实现课程与学生由“消遣”到“反思”的转变;再者,按照“反思性”、“生活性”的课程定位,民俗课程内容的选取无论是专业课还是公选课皆不以一味“迎合”学生口味与设想为标准,不以“猎奇”、“媚俗”为取向,而是以紧密结合生活为原则,以智识性为追求,选取并讲授相应内容,积极回应现实,用民俗的力量努力化解各种“科学主义”、“消费主义”等现代性理念对人的困扰,树立起以知识权威为先导,进而引领与带动道德权威进行教书育人;最后,我们还要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授人以渔,创设参与体验型课堂。按照“积极动员,深度参与,明确要求,加强指导,答疑解惑,质询探究,及时总结,相互交流,教学相长”的具体要求有序进行。

【作者简介】崔家田(1979—),男(汉族),河南宁陵人,讲师,博士生,现供职于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主要从事历史社会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从事民俗文化教学工作。

刁统菊 赵容：山东中元节述略

历朝历代中元节普遍以七月十五为期,其活动内容既有与宗教有关者,也有一般人家所行的祭祖之礼,而且通常并行不悖。其中荐新祭祖一直是一般民众的主要活动。明清两朝至民国年间,山东中元节以“祭祖”这一基本内容最为普遍。中元节一直是一个内容丰富多元,流传范围广、具有民族和区域特色的节日。目前来看,南方比北方要隆重。其中山东地区的中元节无论是节期还是名称均延续了明清以来的习惯,在活动内容上也以祭祖(以居家祭祀或上坟祭扫为主要形式)为主。区域分布上,山东中元节习俗活动几乎涉及全省大部分村落,其中以鲁中地区的祭祖活动最为典型。因此中元节在山东节日体系中的地位也存在区域差异。

【作者简介】刁统菊: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民俗研究》、《节日研究》编辑,研究方向为亲属制度、村落民俗。赵容: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冯文开：口头诗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自口头诗学 (Oral Theory) 创立起, 它便与古典文学研究密切关联。中国学人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系统地将它引入国内, 且在将它本土化与成功实践之后, 它逐渐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理论参照, 给传统的古典文学学科研究范式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这里拟就口头诗学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的发展作一个初步的介绍与述评, 探讨它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研究书面范式的异同, 试图对它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应用前景做出一定的估价。

【作者简介】冯文开,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博士。

何彬：冲绳村落的盂兰盆节和祖先们

笔者在日本冲绳做过数年村落调查。其中的调查报告在该村做了调查汇报演讲, 而后被该村村史收录。本文通过关注村民盂兰盆节的基本行为流程, 尤其重点观察和记述盂兰盆节第一天早晨迎接祖先回家、第三天傍晚家家户户送祖先的接送仪式以及村子青年团在村内各处绕行歌舞等行为表象, 捕捉村民意识深层的祖先观念的结构和性质, 然后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解析该村落的祖先信仰层面的基本要素及特征。

夭折孩子的灵魂、自家祖先之外的亡者灵魂也都可以在盂兰盆节期间享受现世人们提供的祭品。然而接受祭品的形式和时间、地点, 在盂兰盆节期间的待遇侧重均不同, 这构成了当地盂兰盆节的特色并由此展示出当地人们祖先观、灵魂观的结构特征。

【作者简介】何彬, 1993 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 2011 年日本神奈川大学历史民俗资料学博士, 现任日本首都大学人文社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贺学君：传统礼仪的“神”与“形”

传统礼仪作为人类在文明进化中逐步形成并与一定社会制度相适应的行为(事)规则及其意识观念, 是人类所创造的整体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 它既是人类的一种精神创造, 就自然地服务和服从于人类精神文明的进化, 因而历史看, 它又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从礼仪内核来看, 其基质与人类积极本质一脉相通, 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延续性, 是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的社会(生活)行为中的具体实现, 对历史进步人类发展起着无形而深远的影响。礼仪文明如何, 体现着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它不仅内容丰富, 所涉及的范围广泛, 而且具有浓郁的历史性与鲜明的时代性。传统礼仪在历史发展中累积形成复杂的内涵, 就内容而言, 既有精华(优秀的)也有糟粕(落后的)。这里所讨论的是指对今天仍有积极、普遍意义值得世代相传的传统礼仪。

今天谈传统礼仪, 不是一种静态的知识性的介绍, 而是针对我们当下道德滑坡, 文明失落的现状, 寻求通过传承和创新传统礼仪, 更好地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召唤民族精神之魂。以成年礼为例提出了传统礼仪之“形”时, 更要理解传统礼仪之“神”, 然后由神形结合, 推陈出新, 构建现代人能够接受的新规则, 最终达到创造性传承。

【作者简介】贺学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黄景春：当代民间叙事的文化幻象——上海都市传说的文学解析

上海都市传说是上海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地域性、传统性、当代性等特点。延安路高架桥“九龙柱”的传说、太平洋百货的传说、漕宝路地铁站的传说、恒隆广场的传说等都是上海流传广泛、影响较大的都市传说。上海都市传说与欧美广泛流传的消失的搭车客、钩子杀手等传说没有太大的一致性。这些上海当代传说中的人物与中国古代传说有一脉相承之处，情节类型也比较相似，表现的却是当代人对迅速发展变化的城市面貌和城市生活的独特理解，其中有的传说，如风水传说、吸血鬼的传说，也包含了对剧变中的城市的某种隐忧和焦虑。这些当代传说提供了新的故事，依托近年新出现的建筑、道路、车站、校园等标志性公共场地创造了一系列崭新的文学形象，体现了人们试图通过情感和想象把握和理解这座城市的努力。上海都市传说是一种当代民间文学，它为高度物质化的都市建筑群落初始性地创造了一个富有童话色彩的文学世界，并以一种浪漫的、诗意的方式开拓了城市文化的意义空间。

【作者简介】黄景春 男，河南确山县人，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民间信仰、民间文学。

黄岚：清代东北地区满族饮食习俗考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经济发展的差异，形成各地各民族不同特色的饮食文化。居住在东北地区满族由于其特殊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其饮食习俗具有一定的民族特征。这种特征既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经济的反映，也是其民俗文化和生活状态的体现。因此对其饮食习俗从饮食源流、食物结构、饮食器具、饮食方式、饮食禁忌等几方面做一全面地考察和研究，这对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及生活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满族的饮食特点的论文虽然不少，但是大部分是只是介绍其饮食特点，对于其饮食结构、饮食器具、烹饪方式很少涉猎，本文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对清代东北地区满族饮食习俗进行考略，从本文参考的众多历史学、民俗学及考古学史料中可以看出，满族先世的饮食习俗是一脉相承的，不是因为朝代的更替而其饮食习俗就发生变化，饮食习俗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循序渐进地改善。

满族的饮食习俗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习俗综合体，其形成取决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以及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文明程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饮食条件也会日益改善，越来越科学。而从满族饮食习俗的演变，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满族的民族特点和传统风俗以及满族的历史进程。

【作者简介】黄岚，女，满族。1989 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任吉林省博物院古代史部副主任，研究馆员。吉林省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黄清喜：民俗为民众身体感受的生活事象

生命哲学将民众在历史和现实中的身体展演了出来，从而加深了人们对身体的思考。那么，这一理念对民俗学的研究者有何启示呢？其实，我们从生命哲学的身体概念出发，将生命哲学的理念引入民众的生活，可以推断出这样一个结论：民俗是民众在以他们的身体感受谱写自己的生活经历。因此，对于

民俗学的研究者来说,研究民众身体感受之生活事象极为重要,所谓“眼光向下”就是感受民众身体感受之感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俗即为民众身体感受之生活事象。

【作者简介】黄清喜(1976—),男,江西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 2010 级博士研究生,从事民俗学和中国民间文学方面的研究。

黄涛：从语境理论角度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作为一种活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样态和生动内容存在于特定语境之中。文化事象与文化语境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被简单地去掉语境因素的文化事象只是静止僵硬、残缺不全的文本形式。文化语境的构成要素可从两个纬度来把握。从时间维度看,文化语境分为历时的传统规约和共时的环境条件两方面;从空间维度看,文化语境可分为现场情景和社会文化背景两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文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关于保护工作的阐释就是在关注语境要素的基础上作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保护工作有两种:一是对在现代社会仍有存活价值的文化事象应大力扶植,保护其赖以存活的土壤,使之在现代社会传承下去;二是对不适应现代社会环境,因失去存活价值而正在衰亡的文化事象,要完整地记录保存,不仅保存其文化事象,而且保存其文化语境。今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语境保护方面应制定细致可行的操作规范。

【作者简介】黄涛,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民俗学学科(浙江省重点学科)负责人,温州大学“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主任。1999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从师于钟敬文教授,获民俗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20 年,2008 年 2 月引进到温州大学。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浙江省民俗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中国分会副会长。代表著作有《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民间语言志》《中国民间文学概论》《流行语与社会时尚文化》《中秋节》等。

吉良新 仪孝法：山东日照渔民渔业行规调查

沿海渔家的生产、生活习俗,不仅成为日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海洋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深刻反映了海洋对人们心态、情绪乃至性格的影响,也制约规范着渔家人的道德和行为。

渔家行规是由海上生产的艰难和风险世代相传约定俗成的,这种约定俗成,规范着渔家的生产和生活行为。具体内容主要有:一、父子不同船;二、救人危难;三、绝对服从;四、拣浮水(溜海);五、安全防护;六、护海养海。

【作者简介】吉良新,男,教授,山东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学院院长,校旅游文化研究所所长;仪孝法,男,山东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学院教研室主任,校旅游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蒋萍：没有调查 没有发言权——再论民俗学的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是民俗学人进行专业研究应该身体力行的基础研究方法之一。本文从民俗学田野调查的缘起出发,回顾了毛泽东《寻乌调查》的经验和方法,结合笔者本人参加的广东连南瑶族调查实际,总结了田野调查中容易遇到的语言障碍、天气人力、身体状况、“同乡人”问题及应该注意的事项等等。

田野调查强调实地考察,深入民间社会,直接采集民俗资料,去理解当地民众的生活。我们的调查

以什么样的形式，在什么状况下展开，研究因此受到了什么影响，都是田野调查必须考虑的。这样既可以得到忠实可靠的资料，又可以修补前人调查资料的不足，是我们民俗学中较为可靠的研究方法。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是对调查对象有发言权的基本前提。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也没有发言权。

【作者简介】蒋萍，女，瑶族，湖南江永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民俗学 2010 级硕士研究生，中国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方向。

蒋 玮 沈建东：苏州花朝节的复原与重建

苏州花朝节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活动丰富且形成体系，官府、民众皆要参与其中。明清以降，苏州方志笔记、小说诗文中对花朝节开始有了明确的详细记载。苏州花朝节在时间、场所、习俗等方面的“规范”约在明清时期完全定型和成熟，这些细节设置中都受到苏州传统文化的浸蕴和影响。在时间的选择上，苏州地区风俗不同于唐、宋古制而以农历二月十二日为花朝节。对场地的规定中，过节时不仅要各自在家或郊外游乐，官、民皆要到花神庙中烧香供奉。就节俗活动的设置而言，除延续各地皆有的饮酒赋诗赏花等外，苏州地区还以“扑蝶”、“赏红”来点缀节日，又去虎丘花神庙献供祝寿、吃寿酒、唱堂名、夜游灯会等，另要吃油炸玉兰片应节等。

花朝节在吴地的传承、流行，与苏州地区特有的花文化传统有着密切联系。苏州传统文化在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环境基础两方面都与花朝节的文化精神极为契合。在自然条件方面，苏州地处江南，花事滋荣，可谓一个花的城市。在人文基础方面，吴地深厚的人文底蕴奠定了其花文化的基调。虎丘花农种花、护花，宋以后已形成花业雏形；苏州百姓也爱花、惜花，衣食住行生活全方位皆有“花”的影子。

就苏州花朝节的重建，本文从重建花神庙、复原花朝节、恢复节俗活动、打造育花基地、鼓励花俗研究等方面提出建议，为花朝节的文化复归描绘可行的蓝图。

【作者简介】蒋玮，女，江苏丹阳人，文学硕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在苏州博物馆民俗部从事吴文化及民俗研究。沈建东，女，江苏苏州人，史学学士，毕业于江西大学历史系，现为苏州博物馆民俗部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苏州吴文化学会理事。

焦虎三：白马服饰图纹的特点与底层结构

本文结合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绘画构图学等相关知识，分析了川陇区域白马藏族（白马人）服饰的基本表征方式，并以几个典型图案为例，归纳出白马人服饰的底层结构及其象征意义，并对与其底层结构相关联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试析。

【作者简介】焦虎三，男，（1968 年～）祖籍河南偃师，生于四川成都。研究少数民族文化资深作家，文化人类学者，中国民协下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专长于羌藏历史文化与民俗文化研究。至今已出版少数民族研究专著 6 部，在国内发表相关学术论文以及人文地理类文章数百篇。

赖婷：传统的发明——以福建永安的“竹神”为例

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一书中指出：那些表面看起来或声称古老的“传统”，其起源时间可

能是相当晚近的，甚至是被发明的。这引导了我们去关注当下“传统的发明”。传统为何被发明？如何被发明？被发明的传统有何意义？福建省永安市自 2002 年起于每年 10 月 18 日定期举办笋竹节这一新型的节日，为此，当地政府发明了一位竹神，以构建当地的竹文化传统。本文对竹神传统的发明过程进行了梳理。竹神的发明以当地政府为主导，由当地的文化精英创造竹神的神话、传说及小说《竹神传奇》，并建造竹神庙、竹神塑像，举办竹神节。竹神的发明结合了地方文化、地方信仰，地方传说，在多元力量的推动下，竹神逐渐被赋予了传统的形象。发明竹神的动力来源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传统的诉求。本文以竹神传统的发明为例，意在从“传统的发明”的角度来反思“传统”。关注传统与新兴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新兴也需要“传统”联系着过去与未来。无论是“相对传统”的传统，还是当下发明的传统，正因为我们需要传统，才会不断地出现“传统的发明”。

【作者简介】赖婷，女，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间文学。

李丽丹：论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讲述的英雄故事

——兼与蒙古英雄史诗比较

《老故事家朝格日布民间故事集》共收录了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讲述的 53 则民间故事，其中有 6 则为具有民族特色英雄故事。它们与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演述传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叙事主题上具有鲜明的一致性，均为主题单一的婚姻型英雄故事，征战内容只是为英雄的婚姻服务，英雄故事的叙事母题主要由英雄史诗的核心母题与其他民间故事常见母题复合而成。

朝格日布的英雄故事是流传于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族英雄故事的代表，其故事母题和情节单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阿尔泰语系其他民族的民间故事中也存在大量的异文，其的形成与蒙古族英雄史诗的演述传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叙事内容上来看，尤其是母题与类型上与英雄史诗有密切关系。作为一名能讲唱史诗的故事家，朝格日布讲述的英雄故事与他演述的英雄史诗和在鄂尔多斯流传的英雄史诗在母题叙事中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如史诗母题的铺排式诗性语言的程式化表述在英雄故事中被简化，英雄故事中动态母题多而静态母题少，英雄故事中的角色母题较为简单，功能较为单一等。形成异于史诗叙事的英雄故事叙事的主要原因主要在于演述方式的不同影响史诗叙事与故事叙事对母题的取舍与表现，演述语境也影响了英雄史诗与英雄故事的母题构成。

【作者简介】李丽丹，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学院博士后。

李小玲：作为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间文学

——兼及对胡适白话文学的新的阐释

以二十世纪初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构时期的三个关键词即梅光迪提到的 Folklore, Popular poetry, Spoken language 为切入点，结合史实判断，对民间文学学科研究对象进行梳理和研讨。通过对三个关键词及与胡适白话文学运动的关系的剖析和深入，一是明确民间文学学科的文学定位；二是揭示学科形成背后的思想主导，即挖掘胡适白话文学运动的内在立意，同时使梅光迪的民间文学学科关键词获得证明和根据；三是对白话和白话文学作出新的阐释，即作为一种概念表述，所谓白话文等同于国语，白话文学等同于国语文学，实际上是一个依据想象而建构的概念。换言之，作为学科意义上的民间

文学更多的是精英主体出于文化建构的想象之物。而“白话”也不仅是一语言概念，因为白话本身就寓意民间，而且，较之“大众”“平民”等以阶层来区分的词语，“白话”更少意识形态的侵袭，更有其单纯性和合理性。同时，“白话”的术语也顺应了当下诸多人文学科日渐关注事实语境的发展态势，能为民间文学学科的阐释“提供更好的参照框架”，使“学术话语变得更加清晰”。本文试图在历史和当下的双重维度下获取对作为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间文学有一更全面和客观的评述，以为当下学科的发展有所推进。

【作者简介】李小玲，江西人。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文艺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民俗学、民间文学等。

梁起峰：从电子媒体看女娲神话的当代呈现

女娲神话是中国民间文化中非常宝贵的资源，但却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只以片段的形式残留在各类书籍中、文物画像上。另一方面，女娲神话又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流传至今，真正地活在民间。在新神话主义浪潮到来之际，从电子媒体的当代呈现中看女娲神话，借此分析其背后的意义。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寻根意识的当代体现。

【作者简介】梁起峰，女，汉族，山西太原人，2011 级硕士，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专业学生，研究方向：民俗学。

林德山：民俗旅游对目的地社会的影响研究——以日照市为例

民俗旅游是民俗与旅游的结合，是以民俗事象为主要内容的旅游活动。在民俗旅游这种流动的过程中，必然要使两地之间的文化（民俗）发生接触、碰撞，进而或多或少地渗透融合，我们必须区别不同的旅游形式和旅游业态，并区别旅游业给东道地区带来的影响（冲击）范围。民俗旅游作为日照市旅游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发展过程中对当地社会尤其是参与民众带来了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通过分析影响的因素和现状，提出了“发展民俗旅游，怎样保证旅游活动作为民众生活的一个部分长久的存在下去，又怎么保证旅游目的地现有的经济、文化和环境资源能够惠及子孙”的思考。

【作者简介】林德山（1979-），男，山东莒县人，日照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中国民俗学会会员。

林海聪 王霄冰：从清明公祭传统的演变看礼与俗的关系

本文旨在通过回顾“清明公祭”传统的演变史，来探讨历史脉络中的“礼”与“俗”的相互作用，以便更好地理解民俗在中国文化史中的特殊地位，及其与上层文化之间的交融与互动关系。

【作者简介】林海聪：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民俗学硕士研究生，民俗学论坛志愿者。王霄冰：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研究员、民俗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晓平：客家的山神与水神信仰——以三山国王及储君信仰为例

在客家地区，对于山神与水神的信仰是其民间信仰的一大特色，本文拟在历史文献及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在客家地区影响很大的山神（三山国王）及水神（储君神）信仰略作叙述，并对山水之神角色与功能的嬗变等问题进行思考与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在客家民间信仰中，无论是山神拟或是水神，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其角色或功能一般都会经历一个嬗变的过程。

三山国王角色的嬗变表现为：其一，神人化，即从山川之神到神人一体；其二，历史化，即从神话传说到貌似真实的历史；其三，社会化，即从孤独的山川之神到人间“国王”；其四，地域化，即从山川之神到地域之神。储君的功能在历史上不断扩大，逐渐具有了佑水上安全、克敌制胜、祈雨而灵等神奇功能，在当地，人们又视之为地方的福主亦即保护神。

从三山国王及储君神信仰的两个案列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从历时性的角度看，民间信仰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即大功告成、千年不变的，实际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无论是山神还是水神，拟或是其它神明，在民众的信仰中，其功能有逐渐放大的趋势。

——在客家地区，山水都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客家地区山水相依，构成其地形地貌的两大重要要素，而客家的山神水神信仰之间的关联，似乎也有进一步研究和揭示的必要。

【作者简介】林晓平，江西赣县人，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教授、博士，民俗学硕士点领衔导师、江西省“重中之重学科”民俗学学科负责人，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

刘爱华：走出“围城”：网络媒介下民俗文化资源观的形成

在信息社会，网络技术广泛渗入民众的生产、生活 and 工作中，催生了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民俗文化也在网络技术的“催化”下，衍生出一种“他”俗文化，导致民俗文化非在场性的进一步加强和民俗文化共享主体的进一步拓展，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现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保护工程基于开发和利用的立场，以民俗文化为主体，迎合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的需求，激活了民俗文化的应用性潜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理论上民俗文化资源观的形成。这种理论探索超越了遗产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民俗文化产业化的实践，是民俗学者面对民俗文化在当代社会重大变迁境遇下现实发展可能性探索的一种理论思考，也是尚存悖论但又不得不为之的一种理论建构。当然，这种理论探索，不等于赞成商业化，而是在认同和尊重民俗文化内价值的基础上，站在广大民众现实需要的出发点上，拓展民俗文化的现实服务功能，从而推动民俗文化适应社会发展的一种理论诉求。

【作者简介】刘爱华（1978-），男，汉族，江西南昌人，民俗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师，主要从事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研究。

刘百灵：洛阳传统婚俗与现代婚礼的文化思考

婚礼是一个人一生中的大事，无论从古至今，人们都非常重视。婚姻又是关系到人类自身繁衍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而又最基本的礼仪活动。婚姻礼仪向周围的人宣告了一个新家庭的诞生。此外还意味着这

一个家庭所属的家族的兴旺发达，它不仅是一对新人的“终身大事”，也是双方家庭家族及其成员的一件大事。人类在经历了群聚相处，血族婚、对偶婚后，出现了以婚礼来规范异性结合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方式，这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标志。古代婚礼起源于西周时期，对其后各朝代的婚姻礼仪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代婚礼，比之古代和近代婚礼虽然有了很大程度的简化，但是由于相互攀比之风盛行，使得婚事大操大办，费用逐年上升，而婚礼中的传统文化元素却越来越少，盲目追求西方文化，使得婚礼雷同、庸俗、缺少真情，有的甚至演变成一场闹剧。本文将洛阳传统婚俗与现代婚礼做一对比，探索现代婚礼的发展方向。

【作者简介】刘百灵，男，1952 年出生，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洛阳民俗博物馆馆长，现为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刘德龙：山东人“闯关东”的历史影响和文化内涵

历史上山东移民东北的问题，引起相关省份以及其他地方的人们的关注，包括学术界、文学艺术界、政界都有所涉及，还形成过学术上研究“闯关东”、艺术上演绎“闯关东”、民俗上展现“闯关东”的文化热。已有的研究成果说明，山东人“闯关东”作为一种大规模移民现象，具有深刻的历史影响、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是研究移民习俗的一个重大题材。

山东人“闯关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山东人“闯关东”，不仅对移民本身，而且对于民族、国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包括对中华疆域的护卫和巩固、对迁入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对人口的合理分布、对人口素质的提高、对民族间和地区间的交流与融合、对迁出地区经济社会的转型等，均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山东向东北大规模移民，是迁出地和迁入地人文状况、社会变迁、经济状况等在某种程度上的反映。各个历史时段的移民现象，都与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状况有密切的联系，亦与山东区域社会的人口、地理和文化性格紧密相连。深入研究这一历史文化现象，不仅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的变迁大有裨益，而且对于认识历史上山东人的生存环境与文化选择、适应能力与生命活力富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可以深刻解读迁出地区和迁入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演变。

闯关东问题牵涉到多个学科，包括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人口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生态学、生物学等，研究价值很大，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需要，也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从学术上深入研究山东人移民东北现象，恰逢其时，大有可为。这方面的研究填补了国内外学术空白，促进了相关地区地域文化的研究，有利于对山东精神的研究，有利于建设标志性文化，推动文化产业开发，有利于推动省际间、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关于山东向东北移民的有关学术问题，本身很有意义。但是就目前山东省和东北、华北相关各省的研究来说，涉猎的面还不够宽，挖掘的还不够深。如果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作为山东省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来建设的话，仍有很多值得开发的空白区域。

【作者简介】刘德龙（散文笔名“路柳”），山东省滨州市西关村人，1952 年古历 2 月 17 日生。现任山东省社科联副主席，研究员；山东省政协常委、省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文化组组长；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民俗学会会长等。

刘文江：西北民间祭祀歌中的神话范型、典型场景与主题

史诗与仪式歌中的祭祀歌分属不同的口头诗歌体裁。尽管如此，如果对口头程式理论中的概念和研

究路径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我们仍旧可以利用这一理论来探讨祭祀歌的形式。本论文借助这些思考探索了在西北民间祭祀歌中存在的神话范型、典型场景与主题。论文强调了祭祀歌在演述时是以建构神圣性为其主要目的的，在这一背景下，演述中的歌手与听众共同构建了“仪式的约定性”这一交流规则，而它则为祭祀歌的形式提供了牢固的稳定性。这也意味着“传统”在其中占据主要地位。“传统”在祭祀歌中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主题，而要研究它我们则需要回到中国的信仰叙事传统中，通过比较的方法来呈现。祭祀歌的主题与史诗主题所区别的特点是在命名上它不是名词化的，而是出于表演中“歌”与舞蹈和动作结合的理由，被以动宾结构的词法所命名。因此，在祭祀歌的主题中，呈现了动作性的主题与名词性的主题两种形式，而这两种主题的表演均体现了神圣性建构的目的。

【作者简介】刘文江，就职于兰州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中国民间文学史），中国民俗学会理事。研究方向：民间传说、口头诗歌。

刘晓丽：关于河曲民歌保护与传承的思考

河曲民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绚丽的光环，但光环之后是不容乐观的现实，留给我们共同的思考是如何保护与传承这一历史的瑰宝。保护与传承河曲民歌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任务艰巨。通过对河曲民歌现状的调查，文章着眼于民歌保护最主要的因素农民主体，文化空间，民歌自身这三方面，深入思考如何从调动农民主体的积极性保护传承民歌，创造适宜民歌生存的文化空间，以及促使民歌自身发展方面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来保护和传承河曲民歌。

【作者简介】刘晓丽，女，于2012年7月1日毕业于晋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考取中南民族大学民俗学专业研究生。

陆建芳：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操作规程》的研究

随着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的不断深入，非遗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相关研究者与保护单位走进田野，以求进一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与真实性的内涵。基于此历史使命，由南京博物院民族民俗研究所执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操作规程》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形势对非遗保护工作的要求，选取江苏省境内具有代表性及研究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结合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历史学、生态考古学及文化遗产学等学科的研究视角，总结归纳更符合地方实际情况和时代需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操作规程》（文后简称《规程》）。

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操作规程》的主要目的是为田野调查研究者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本方便携带、容易阅读的操作手册，协助使用者对非遗田野调查有清晰的认识；同时在附录部分，通过深入浅出的文字说明，帮助使用者了解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什么是田野调查以及如何开展非遗田野调查。最后将访谈提纲、调查表格以及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保护（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置于文后，提供使用者参考。

【作者简介】陆建芳，南京博物院民族民俗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江苏省民俗学会秘书长。

陆晓芹：作为治理方式的民间歌唱

——以广西西部靖西一带壮族社会的歌赛为个案

在广西西部靖西、德保县一带壮族民间，聚会对歌曾经具有普遍性，当地壮语称为“吟诗”。被誉为“歌圩”、“歌节”的地方性节日“航单”成为人们聚会对歌的重要季节，个体家庭、村落、圩镇请歌者前来“吟诗”，可以使家屋、村落、圩镇变暖。但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自发的“吟诗”活动越来越少。与此同时，有组织的歌赛作为一种“被发明的传统”，成为“吟诗”传统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当代壮族“歌圩”的重要表征。通过对歌赛历史和结构的考察可知，它在民间社会仍具有“暖村”、“暖圩”的意义。但从歌台、组织者、评委和命题来看，它与传统对歌也有明显的不同。作为歌赛演述场域的歌台，通常设置在圩市或村落的学校、戏台等公共场所。在一次歌赛中，组织者、评委、歌者、观众、山歌音像制品售者，甚至是地方文化研究者，均会参与其中，围绕歌台展开活动。但占据歌台核心位置的是作为国家在基层社会代理人的组织者和作为地方知识精英的评委。他们掌控整个歌赛，通过给定命题传达主流价值观，体现了其中的国家在场，也突显了歌赛作为治理方式的意义。

【作者简介】陆晓芹，壮族，广西靖西县人，民俗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口头传统与壮侗语族歌唱文化研究。

吕书宝：《淮南万毕术》民俗信仰的文化解读

刘安主编的《淮南万毕术》，历来被认为是谈论“神仙黄白”的方术著作，用现代表述则称之为我国古代有关物理、化学方面的文献。因此，一般研究者均承认该书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是又指出其决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著作，因为除观察实验所得之外，该书有相当数量的想象推理。其实，该书作为一部西汉中叶社会转型期激烈政治斗争中问题人物撰述的问题著作，在产生不久的两汉之交就被高端质疑甚至要严惩推举者，命运已经近似于后代所谓“禁毁”、“封杀”作品。这样命运多舛的著作，之所以能够在历史长河中多次失而复得辑佚钩沉绳绳不绝，并不是因为它的实用价值如何了得，反而是因为其想象推理形成的浪漫特质备受文化精英喜爱。而这种特质形成的主要推手，则是该书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蕴涵的民俗内蕴和浸润的文学因子、进而综合显现为文学价值。这才是历代文化精英对其喜爱有加、搜罗阅读揣摩濡染临摹演绎乐此不疲的真正原因。文化精英的文化活动大多结晶为传世文学名著，其中对《淮南万毕术》精华的吸取，自然就显现为文学色彩之一，这从文化积淀方式方面，印证了该书文学因子的重要价值。而该书民俗内蕴的丰赡，又在蕴涵其精神的文学作品被流传抬扬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者简介】吕书宝，男，汉族，辽宁省沈阳市人，文学博士，教授；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马根权：节日中的民间信仰——临洮县衙下集拉扎节形成原因分析

民间信仰是众多传统节日中的一个重要因子，现代社会虽然出现了节日中各种信仰仪式衰退的趋势，但它仍然是维系节日传承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拉扎节是一个地方性节日，它以“跳山神”这种

独特的民俗事项为其主要节日习俗，透过现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山神崇拜观念是维系拉扎节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于拉扎节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无具体文献记载，当地群众只是按照约定俗成的日期，年复一年地进行着这种民俗活动。本文从拉扎节及其跳山神活动的存在现状、拉扎节的传说、拉扎节及其跳山神活动的生存空间以及拉扎节背后的意义之网四个方面来具体分析拉扎节及其跳山神活动的实质内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拉扎节的形成原因。

【作者简介】马根权（1986—），男，汉族，甘肃临洮人，西北民族大学民俗学 2010 级硕士研究生，区域民俗研究方向。甘肃兰州，730030。

孟令法：杨府爷信仰在畲族社会中的辐射性影响研究

——以凤阳畲族乡顶堡村杨府爷信仰调查为例

作为温州区域文化的典型代表，杨府爷信仰具有显著的封闭性。而于明中期最早入迁温州苍南地区的畲族，在民族文化的交流中，杨府爷也逐渐深入畲民社会。经历近五百年的畲汉互动，杨府爷信仰在与祖先崇拜、土地祭祀、猎神供奉和陈十四信仰等的比较中，在畲族社会中并未占据重要位置，只是在信仰文化圈的辐射中，以族际认同为基础得到了奉祀。浙江省凤阳畲族乡顶堡村杨府爷信仰正是这种辐射性影响的典型代表。

【作者简介】孟令法（1988.6.22），男，汉，江苏沛县人，现就读于温州大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所，民俗学硕士研究生，温州市民俗学会会员。

彭佳琪：亲属称谓与香火继承

——论吴江和嘉兴地区“两头挂花幡”的婚姻形式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提到“两头挂花幡”的婚姻形式，这是基于父系传嗣和单系继承的父系继嗣原则上对婚姻制度的修改。但是在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且事实上已经实现了男女享有平等的继承权的今天，费孝通的调查地开弦弓村所在的吴江市以及与吴江市相邻的嘉兴市，“两头挂花幡”的婚姻又流行起来。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对比这两种“两头挂花幡”的婚姻以及传统的嫁娶婚姻，可以发现，现在的这种婚姻形式虽然是女性在财产和亲属关系上享有同男性平等的继承权的体现。但是，在这种婚姻中新一代对父辈和祖辈的称呼上用“父系亲属称谓”替换了“母系亲属称谓”，由此可以看出以男性为主，强调父系的宗族规范和亲属规范的亲属制度的观念并未消失，而是根深蒂固于民众的思想中。

【作者简介】彭佳琪，女，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专业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彭伟文：民俗体育研究的现状、问题及其可能性

民俗体育研究正在升温，但是在研究参与者方面呈现出民俗学界不在场的现象，而在适用理论方面则呈现体育学不在场的现象，存在严重的悖论式学科倒错，不仅大大制约了民俗体育研究的质量，而且使民俗体育的研究成果无法为民俗学的发展提供学术积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民俗学界和体育学

界研究者共同努力,寻求民俗体育这一具体的研究领域的合理的研究方法。由于民俗的实践性特点,身体知等体育学和运动学理论不仅可以运用在民俗体育研究上,还可能为民俗学提供新的理论支持和研究视角。

【作者简介】彭伟文,浙江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体育文化研究基地专职研究员、讲师,日本神奈川大学历史民俗资料学博士。

萨仁高娃:墨西哥 Yaqui 印第安人夏至仪式的当代传承

居住在墨西哥 Tijuana 市近郊的 Yaqui (族)印第安人的传统仪式因 15 世纪末西班牙殖民者的到来而遭到强制性停止的命运。随着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政策的缓和而逐渐复苏。20 年前,在长老 Cachora 的努力下,恢复了被中断很久的传统仪式。那是主要在,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举行的祭太阳,天地和祖先的仪式和汗屋仪式。

在 1960 年代,美国人类学者 Carlos Castaneda(1925 - 1998)做了 Yaqui 族长老 Cachora(1909-)萨满的的徒弟,记录了 Cachora 的民族文化知识,并在 Cachora 的指导下使用植物进入幻觉状态之后把所体验到的内容写下来进行了出版。他的书在 1960 年代和 70 年代风靡美欧国家,他成了富翁,也成了体验型新萨满教的先驱者。但问题在于,其一,他成了富翁之后对 Cachora 长老没进行回访和答谢。其二,起初他尽量忠实地记录了 Yaqui 族的传统文化和智慧。可是后来,用引起幻觉的植物之后,只顾记录自己个人的体验,而脱离了 Cachora 的指导,所以所写的内容的真实性遭到了怀疑。这件事招来了 Cachora 长老对外界采访者的极大的不信任。对仪式不能拍摄和录音。另一方面,欢迎印第安不同部落的人和世界各地的人来参加祭祀和汗屋仪式。看起来似乎矛盾的背后隐藏着,记录和研究民族文化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问题。在本次发表中试图要探讨这个问题。

【作者简介】萨仁高娃,女,生于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学术博士(2011年)。主要研究内蒙古科尔沁的萨满教。

沙金:试论索伦鄂温克人“毛哄”传统社会文化功能

鄂温克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三少数民族之一。作为北方一支古老的民族,索伦鄂温克人是北方通古斯人最大的地域集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了属于本民族的经济和文化,谱写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发展史。索伦鄂温克人在进入呼伦贝尔草原之后,在语言、信仰、社会组织,主要是家族组织“毛哄”等方面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毛哄”构成了索伦鄂温克人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 and 经济组织单位,“毛哄”维持家族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维护家族的共同利益,在鄂温克人生产生活、血缘联系、社会道德、社会行为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对鄂温克族起着强有力的约束力和凝聚力,对整个古代索伦鄂温克人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的功能来阐述索伦鄂温克人“毛哄”的传统社会文化功能。(一)整合功能。通过“毛哄”这种血缘组织的整合功能,使得古代索伦鄂温克人的社会有序化、统一化和整体化。

(二)协调功能。在生产资料的公有与家庭财产私有之间的矛盾下,“毛哄”时刻都在调节和化解各种冲突和矛盾,以保持家族成员的密切合作,维护整个家族利益和家庭个人利益。协调功能成为了“毛哄”最主要的传统功能。(三)感化功能。由于古代索伦鄂温克人长期处于“毛哄”家族的保护和管理约束之下,家族成员之间结成了稳定的经济关系。而且通过婚姻联系,产生了亲情上的结盟。

在“毛哄”的各种功能的作用下,使人们逐渐形成了稳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思想情感、共同

语言、共同信仰和共同的心理素质，这些都有利于整个古代索伦鄂温克人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逐渐壮大。

【作者简介】沙金：内蒙古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学院讲师、在读博士

沈建东：从“宣卷之乡”同里现象看宣卷与乡土文化传承和教育

宣卷重新在民间的兴盛，而且是在中国目前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宣卷所具有的乡土教化和社会整合作用，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研究的。《同里宣卷》是吴江民间艺术中的奇葩，多用吴方言演唱，以其唱词雅俗共赏，曲调婉转动听，而深得乡间民众的喜爱。2002 年同里镇被命名为江苏省民间艺术之乡——“宣卷之乡”。我们总结宣卷作用有三：其一：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宣卷的乡土教化作用。其二：民间文化的技艺传承和保护研究的作用。演唱用说、噱、弹、唱、表、做，可以在此看到江南的其他艺术表演形式的再现，从他的演唱本子看，有许多借来了昆曲、越剧、锡剧、评弹的表演曲目，如宣卷中有许多经典曲目，《白兔记》、《文武双球》等等，所以可以这样说，宣卷在它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吸取了其他的艺术表演形式，成为了包含多种艺术形式的民间艺术集成。其三：凝结了诸多的传统文化，民俗风情、人文历史，方言土语等等文化元素，具有多样的研究价值。

【作者简介】沈建东 苏州博物馆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苏州吴文化研究会理事，出版《话说媒人》、《苏南民俗研究》、《丝线上的风雅》、《江苏刺绣》等著作。

施爱东：盗肾传说、割肾谣言与守阕叙事

如果我们将笼统的割肾传闻区分为都市传说（盗肾传说）和恐慌谣言（割肾谣言），就会发现都市传说基本遵循自然传播规律，有相对稳定的爆发周期，而恐慌谣言却往往由一些不可预期的恶性事件所引爆，因而具有非周期性的特点。都市传说与恐慌谣言是一种相生互动的关系，传说一旦遭遇可供联想的恶性事件，马上可以转化成谣言。割肾传闻本质上是一种守阕叙事，之所以在中国多地引发骚动，主要是因为撩起了部分民众的侵阕想像，接通了传统采生恐慌的地脉。而现代都市传说中的情色元素，早在清末的反洋教文士手中，已经运用得炉火纯青了。割肾传闻之所以能在这个时代流行起来，一定是直接或间接地迎合了这个时代流行的社会、文化心态或价值观念，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希望或恐惧。

【作者简介】施爱东，男，1968 年 1 月生于江西省石城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石维刚 谭祖武：传统节日的当代新变与重建研究

产生于远古农耕社会的传统节日，总带有蛮荒时代的历史局限。随着社会形态的工业化转型，生存环境的改变必然引起民风民俗的现代改造。当人们由农耕社会的静态生活方式转向于工业社会的动态生活方式之后，生存环境的改变迫使人们改变其社会角色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传统节日的当代新变正显示着民族文化的现代改造。在文化接受过程中，文化接受主体总是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那些文化。人对节日的现代选择是以节日人性化程度为基础的。信息技术的革命和交通的高度发达促进了全球一体化进程，以人性化和科学精神为基础的多元化节日文化理念正在形成。文化文明是社会文明的标志，随着社会的发展，一种具有世界性质素的文化必将是节日文化和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发挥政府的权力优势和

导向作用,兼容并包吸收中外各民族传统节日的优秀元素,加强传统节日象征符号的创意开发,给传统节日注入新的文化内涵,促进社会的文化文明。坚持文化的多元并存和健康发展,前瞻性地主动进行民族文化的世界性改造,才能让传统节日充满生机和活力。

【作者简介】石维刚:男,苗族,生于1966.10,湖南花垣人,主任科员、花垣县民族事务局局长,大学文化,研究方向:民族文化。谭祖武:男,苗族,生于1964.11,湖南花垣人,花垣县民族事务局职员,大专文化,研究方向:民族文化,艺术人类学。

史耀增:合阳县和阳村刘公信仰调查

清顺治二年(1645),代理合阳县令的刘汉卿于危急中搭救了和阳村全村人的性命,村人感其恩德,立祠祭祀,由此形成该村独有的刘公信仰,一直延续至今。本文是对刘公信仰的形成、发展和现状所进行的田野调果。

【作者简介】史耀增,1945年生,合阳县文化馆退休职工,中共党员,副研究馆员职称,中国民俗学会会员,陕西省民俗学会副会长。

双金:蒙古族口承叙事与史诗传统

蒙古人自古以来有口述表演英雄史诗的传统。有学者指出:“世界各地蒙古民族中流传的英雄史诗有600余部,其中除了举世闻名的《江格尔》和《格斯尔》两部鸿篇巨制的长篇史诗外,还有众多的短片史诗和中篇史诗。”蒙古民族创造出了600多部长短不一的英雄史诗,其中人们比较熟知的有《江格尔》、《格斯尔》《罕·哈冉惠传》、《宝木额尔德尼》、《龙·莫日根汗》、《祖拉·阿勒达尔汗》、《英雄锡林嘎拉珠》等。史诗内容大体上均为描绘战争场面,大多是恶魔蟒古思伺机劫掠英雄主人翁的家园,英雄发现后追讨蟒古思,通过激烈的战争最终英雄取得胜利,夺回亲人和财产的复仇主题为主。史诗的人物构件有英雄人物,英雄的伙伴、妻子、家人,英雄忠诚的坐骑,还有英雄的敌对恶势力集团的代表蟒古思等。

蒙古英雄史诗是蒙古族人民的口头创作的文学作品,它反映了史诗创作时代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现象。史诗《英雄锡林嘎拉珠》则反映了当时的蒙古人正处在氏族社会时期,各民族之间战争不断,复仇与反复仇已然变成一种社会制度,变成一种日常生活文化现象。“文化的真正要素是社会制度。任何社会制度都对这一根本的需要;在合作的事物上,和永久地团聚一群人中,有它特具的一套规律及技术”。当战争和掠夺成为一种社会价值准则,从属于它的所有人遵循的生存法则的时候,它必然在思想和行动上体现出来。史诗是活在民众口头上的历史,它必将会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正如钟敬文所讲“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的特点是用语言作媒介,形象地去反映社会生活(人们的行动和思想感情)。”是同样的道理。

【作者简介】双金: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副教授、在读博士。

苏长鸿：“文本”之外：文学、历史与文化

——作为科学话语的“文本”的自我阐释

作为科学话语的“文本”在不同领域被广泛使用和理解，特别是在文学、历史和文化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中，“文本”这一概念不断被借鉴和引申，因而建构了“文本”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话语中的批判和研究的对象。“文本”概念的非自在性决定了它的自我论述必须经由“文本之外”这个阐释策略来完成，在“文本”存在的不同语境中理解其本身的意义，这既是“文本”作为学术概念安身立命的必然诉求，也是研究者将其作为分析工具的必要前提。

【作者简介】苏长鸿，男，生于 1989 年，土家族，湖北恩施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 2012 级硕士研究生。

孙芳：浅谈民俗文物文化价值的实践与思考

年画作为一类有特色的民俗文物入藏博物馆后，通过举办年画贺年展、专题讲座、观众问卷调查与观众进行有效的交流，带给我们一些启示：首先，以年画为代表的民俗文物对今天的观众仍有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源自民俗文物的文化价值；其次，展览情境的合理构建，是年画展览成功的重要因素；最后，年画这种民间文化的符号资本也需要“运作”。年画展系列活动的开展使我们对年画的文化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一）、个性化诉求的集体表达；（二）、模式化表达的文化结构；（三）、教化功能的信仰传承；（四）、装饰民居的多样体裁；（五）、谐音象征里的吉祥如意。

【作者简介】孙芳，山东大学民俗学专业硕士毕业，现任职于山东博物馆保管部，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文物的保护、收藏与研究。

孙金奉：以鲁中山区为中心的石大夫信仰考察

民俗学界多数专家认为，石大夫是石敢当的一种变异形式。近年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石大夫与石敢当同属于灵石崇拜，但它似乎有着自身的历史源流。

在灵石崇拜的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关注最多的是石敢当。石大夫信仰习俗，相对而言较为薄弱。虽然前辈学人对石大夫的历史源起、现存的信仰状况做了研究，但是他们大部分认为石大夫隶属于石敢当，是石敢当的一种变异形式。我个人认为石大夫属于灵石崇拜的范畴，但似乎它有着自己的历史渊源。因此，本文试从另外一个角度，对石大夫信仰习俗进行全新的审视。

【作者简介】孙金奉，女，汉族，2010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民俗学专业，现工作于江西省赣州市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孙正国：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口头叙事媒介

由于口头叙事媒介与人类的原初生存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思考口头叙事媒介的本质问题。文化人类学观念中，口头叙事媒介参与建构了神话、史诗等重大文化体裁。因此，口头叙事媒介的人类学讨论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

一是传播媒介的维度，口头叙事媒介呈现出立体性与弱主体性，媒介的工具意义在此获得主体的隐含身份。首先，口头叙事媒介具有立体性（Multi-dimensionality）。口头叙事媒介以声音媒质为基础，以姿态、动作、环境等多种富有文化寓意的媒介元素为辅助，构成其立体性特征。其次，口头叙事媒介具有“弱主体性”（weak-subjectivity）。口头叙事媒介由于是突显在人自身之中的一种媒介，因而具有了人的主体性的某种边缘的、延伸的性质，即“弱主体性”。

二是艺术媒介的维度，口头叙事媒介的艺术创作呈现出人生的仪式性与日常生活的审美特性，同时，口头叙事媒介与人类艺术的起源具有互为性关系。口头叙事媒介的艺术表达具有鲜明的人类学特性。从艺术媒介的角度讲，口头叙事媒介没有分离出纯粹的艺术媒介功能，但在传承和创作口头作品时，口语特质、讲述活动的艺术整体性以及隐在的表演性，寓于口头传统之中，成为文化传统的艺术表达形态和艺术风格。

口头叙事媒介的艺术表达总是以日常生活与民俗仪式为其语境的。在日常交流的氛围里融入生活，口头叙事媒介的艺术品格附着在日常交往的事件处理和情感沟通之中。口头叙事媒介不像技术媒介那样，有着独立的艺术形态，它更主要的仍是传播信息的媒介，但由于其贯穿了审美的题材和摹仿的语言，生动地、灵敏地以修辞的态度激发着日常生活的内涵，以跳跃的机智展现生活的丰富和情思，因此，口头叙事媒介的主体性意味得到绽放，它的艺术能力得到呈现，进而其艺术媒介的身份得以确认。

【作者简介】孙正国，1972年生，土家族，湖北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民间叙事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唐月霞：文化消费时代节日类短信的民俗内涵和作用

在电子媒介时代，民俗传承面临种种挑战。于是，在文化消费背景下，传统民俗与电子媒介的结合，形成了一种有效的传播方式，短信就是其中一种。短信，尤其是节日类短信，作为文化消费方式的一种载体，在电子时代为传统民俗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论文对节日类短信中的节日进行分类，分为传统岁时节日类短信、新兴纪念节日类短信和外来节日类短信，根据各自特点，分别表现了传统民俗传播方式的改变、民俗传播心理的变化和节日文化的扩展三个方面的民俗内涵，同时通过列举各种具体的节日短信，体现短信在电子媒介时代所承载的民俗内涵。此外，节日类短信在电子民俗时代中，为节日产生和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年轻群体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观念，将狂欢心理和娱乐方式融为一体，通过大量的转发短信，赋予了节日文化新的民俗内涵和时代意义，比如光棍节和“中国情人节”。但是，通过短信消费来传播节日民俗的方式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即使节日的文化内涵简单化、虚无化，节日本身的内容和活动无法通过几十字的短信立体呈现在接受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节日的长期、深入发展。

【作者简介】唐月霞，已考上浙江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生，中国民俗学论坛志愿者团队唐小样。

田兆元：民俗文献类文物的价值研究

民俗文物逐渐得到学界与社会的重视，但目前还存在着重视物质类民俗文物，轻视非物质类民俗文物的倾向，而民俗文献尤不得重视。民俗文献类文物文化含量高，但容易流失，亟需保护。民俗文献类文物分为两个大类，一是记载民俗活动的文献，二是承担民俗功能的文献。承担民俗功能的民俗文献之帖式，体现出地方性，文化专题的集成性，同时，由于这些帖式为仪式专家持有，帖式本身的民俗仪式功能与民俗资源载体的功能集合在一起，具有超出一般民俗文物文化含量的特性。

【作者简介】田兆元，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所长，民俗学博士点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神话学，民俗理论，民俗文化资源与应用等。

王柏中：触变与持守：越南瑶族的黑齿习俗

——基于越南老街省保胜县田野调查的探讨

漆染牙齿是人类一种古老的体饰文化，历史上曾在亚太地区广泛存在。瑶族本无漆齿习俗，但有的支系——如越南保胜的白裤瑶（贺瑶），却在与越濮族系的黑齿民族接触中所濡染；受现代审美观念的影响，越南社会不再“以黑为美”，瑶族黑齿习俗也随之变迁。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与相对保守的族群文化，使其成为这一习俗的最后持守者。从本质上看，越南瑶族对黑齿习俗的习得、持守或放弃，均是他们基于生活需要因应环境与社会变迁的文化策略。

【作者简介】王柏中，男，1966年生，辽宁省调兵山市人，中国古代史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历史学一级学科及专门史硕士点学科带头人。

王海娜：大理白族取名字习俗探析——以双廊镇大建旁村为例

云南大理地区是白族的聚居地。双廊镇大建旁村是大理典型的白族村寨，至今仍保留着取名字习俗。

白族人的名字一般有两种，即乳名和学名。孩子在入学以前，一般只有乳名。乳名是没有姓的，由家里的男性长辈来取，不作正式名字使用。待孩子长大要进学校读书时，还要给小孩取一个学名，一般人家就请学校老师代取。与乳名不同，学名通常在正式场合使用，如入族谱、入官方典册、签订契约合同都要用学名。现在，越来越多的白族孩子乳名与学名相重。

夫妻生的第一个孩子，无论男女，都要举行取名字仪式，即由家族中的男性长辈给孩子取乳名。取乳名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家中同辈孩子乳名严格带有同一个字，这个特定的字可以根据长辈爱好而定，也可以根据族谱而定；第二种是孩子的乳名由父母随性而取。取名字仪式一般在小孩满月的时候举行，但由于各家的经济状况和实际情况等因素的差异，村里给孩子举行取名字仪式的时间也各不相同，或者提早，或者推迟。一家如果生几个孩子，那么只给最大的孩子办取名字，不分男女。

取名字仪式的程序包括贴对联、拜本主、宴请宾客、赐名字等，体现白族人尊老爱幼的文化精髓，成为区分血缘关系的标志，起到维护乡村宗族社会秩序的功能。

【作者简介】王海娜，女，辽宁盘锦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2010 级博士研究生，广东省佛山市博

物馆副研究馆员。

王均霞：中国女性民俗研究述略摘要

某种程度上说，女性民俗研究在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史上是一个被边缘化的、隐秘的存在，然而，它在学术脉络里的发展状态实际上又是较为连续的。从中国现代民俗学诞生以来，女性民俗研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一、与妇女解放运动紧密相连的发轫期（1910s~1940s）。该时期的女性民俗研究范式主要有三种研究范式：1. 对女性民俗文化的考据与描述；2. 对女性民俗资料的田野搜集与整理；3. 对女性民俗文化的民族志书写。这三种研究范式均深受当时妇女解放运动思潮的影响；二、服务于政治的改编期（1940s~1970s）。这一时期的女性民俗研究同政治有紧密联系；三、女性民俗研究的成型期（1980s~1990s）。该时期的女性民俗研究日趋成型，主要有两种研究范式：1. 对女性民俗事象的纵向分析与描述；2. 在父权制的框架下，采用二元对立的分析视角探讨女性的权力、地位及主体性等；四、女性民俗研究的发展期（2000~今）。这一时期的女性民俗研究在延续上一时期的研究路径的同时，深受后现代主义女性思潮的影响，尝试将女性放置于具体情境中进行研究，突出女性经验及女性群体的差异性。

【作者简介】王均霞，女，山东莒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讲师。

王明远：枣庄地区“仁兄弟”现象的调查和研究

——以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涝坡村为例

盟兄弟与拜干亲、结干姊妹被人类学家统称为拟亲属，拟亲属是民间社会中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枣庄地区的“仁兄弟”就是这种拟亲属中盟兄弟的典型代表，它与广西“结老同”不同，具有自己的特点：同行业或同乡草根组织；烧香、磕头、滴血、换帖仪式；人数的讲究，“拜七不拜八，拜八死全家”，或者更多；红白喜事的来往；困难的互助等。目前，枣庄的“仁兄弟”结拜正处于一种急剧变化的状态，仪式简化，人数众多，范围扩大，本文就以枣庄市市中区涝坡村为案例，通过田野调查的十几个案例，结合仁兄弟周年纪念照、礼簿、帖书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研究。

【作者简介】王明远，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硕士毕业生，现任职于山东省枣庄学院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中国文化、社会调查等课程。

王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保护工作的思考——以威海地区为例

从 2005 年中国首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普查工作正式启动以来，“非遗”已走过了 7 个年头，经历了 7 年的发展，“非遗”热的温度越来越高，“非遗”动辄被提及，关于“非遗”的活动是越来越多，各级“非遗”名录体系也不断在庞大，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但繁荣的背后是非遗保护工作中所充满的艰辛与无奈。本文将通过笔者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切身经历，展示目前非遗保护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而非遗保护工作如何良性发展作出探讨。

【作者简介】王娜，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 2007 级硕士，现在山东省威海市群众艺术馆工作，主要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王素珍：汉代民俗学研究——概念的提出及研究的再思考

汉代，我国学者不仅关注风俗民情，并将“风俗”作为政治、社会、道德等多方面的一项重要评价指标。汉代形成的丰富的风俗观对当世及其后的社会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汉代民俗学”概念的提出及汉代民俗学研究的开展具有学科史上的意义和价值。自汉代开始，中国民俗学的学术传统基本定型，特别是民俗学“经世致用”、“政治伦理”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传统日渐清晰。这一学术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现代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的方向。

【作者简介】王素珍，女，湖南娄底人，汉族，中国民间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博士后。

王天鹏：生男偏好与固守孝道：客家生育实践的地方性知识阐释 ——以江西赣南白鹭古村的田野调查为例

汉族人的生育观念中具有强烈的男性偏好心理，客家人作为汉族的一个族群也不例外。根据在白鹭古村的调查发现，客家人具有诸多关于男性偏好的故事。据分析，男性偏好的形成具有香火观念、族人歧视、社会性别、高死亡率等多方面的原因。传统孝道思想的根深蒂固是生男偏好的深层原因。

【作者简介】王天鹏，江苏沛县人。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2004 年毕业于云南民族大学民俗学专业，2011 年毕业于上海大学人类学专业，现为赣南师范学院民俗学、社会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客家民俗文化、客家区域社会、历史人类学。

苏日娜 王 焯：北京市蒙古族日常饮食现状研究

口味，是地域文化中最有趣味的代表；饮食习惯，是一个民族隐含在骨髓和血脉中的印记。饮食文化饱含着民族认同与凝聚力，是重要的民族基因。蒙古族饮食文化具有古老而悠久的传统，是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根据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相应而生的，是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关注蒙古族来到北京后其传统的饮食文化发生的变化，从前的饮食结构如何改变并不断进行新的适应和调试，以及由这种变化引发的诸多现象等等，根本落脚点在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保护上。本文将北京市蒙古族分为定居人口与流动人口两大类人群进行研究，针对这两类人群分别制定了不同的问卷进行 SPSS 分析，推理出这两类人群不同的饮食结构，概括出定居人口早餐基本保留传统饮食习惯、“从老家带”是获取传统食品的主要途径、传统饮食制作程序简化、饮食习惯呈“代际差异”、保留传统时地域差异明显等特点，以及流动人口蒙餐市场倾向严重，携带或购买传统即食小吃或“去蒙餐厅”成为进食传统食品的主要途径等特点。

【作者简介】苏日娜，女，蒙古族，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博士生导师；王焯，女，汉族，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吴新锋：奉献与乡愁——稳定性与流动性之间的兵团民间文学

兵团民间文学是中华民间文学大家庭中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崭新成员，它具有典型的移民民间文学的特性，又镌刻下那段独特历史文化背景的民间心灵记忆。学界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间文学的关注和研究非常有限，对兵团民间文学研究中的相关理论问题更鲜有论述。本文希望把兵团民间文学置于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社会历史变迁中，通过对兵团民间文学的稳定性与流动性的阐释，来梳理兵团民间文学的概念、内容分类和特征；理清兵团民间文学传统的形成是一种多元文化建构的历史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散居移民民间文学研究中的问题。

【作者简介】吴新锋（1982-），男，山东临沂人，新疆石河子大学中文系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主要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

薛洁 韩慧萍：非遗保护中关于家庭教育传承现状的分析与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保护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保护，这三大教育构成了非遗的教育保护体系，其中家庭教育传承是最基本、基础的教育保护。本文针对当前非遗保护的家庭教育传承现状进行分析，认真思考，提出实施科学有效的保护措施，目的是要关注和发挥家庭教育传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

一、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家庭教育传承现状分析

1. 家庭结构的调整变化，使非遗家庭教育的传承土壤明显缩微
2. 学校教育的集中作用，使非遗家庭教育的传承机缘大为削减
3. 现代生活的丰富多样，使非遗家庭教育的传承环境受到影响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家庭教育保护的若干思考

1. 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赋予传承人相应的权利
2. 传承人应肩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履行教育传承义务
3. 充分利用民俗节庆契机，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家庭教育传承
4. 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手段，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家庭教育保护

三、结语

【作者简介】薛洁：新疆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法学院教授、硕导，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兵团民协副主席；主要从事民族学与民俗学、非遗保护的教学与研究。韩慧萍，女，汉族，山西太原人，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 2008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与宗教问题研究。

杨利慧：语境的效度与限度

——对三个社区的神话传统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语境研究逐渐成为中国民俗学的主导性研究范式。本文以三个社区的神话传统的田野研究为基础，对语境的效度与限度进行了细致考察，发现语境在形塑神话文本、规定神话讲

述场合、确立讲述人与听众的构成及其规模、决定神话的功能和意义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语境对神话传统的影响具有一定限度：神话的核心母题及其母题链的组合、类型和基本内容，往往呈现出强大的稳定性。就此而言，语境视角未能深入触及口头艺术形式和内容的根本内核，因而具有局限性。对此，作者倡导“综合研究法”。

【作者简介】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神话与神话学》、Handbook of Chinese Mythology（合著）、《女娲的神话与信仰》、《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合著）等多部专著。主要研究领域为神话学、民俗学基础理论、田野作业与民族志。

杨书娟：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征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与思考

为了更好地宣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市在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的基础上筹建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筹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工作由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具体负责。在征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实物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文化区域遭遇到行政区域的划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遭到篡改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生存村落面临着拆迁的境遇；一些项目的征集过程中存在着阻力等。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思考，得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希望对今后的非遗保护工作能起到一点帮助。

【作者简介】杨书娟，2011 年硕士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传统图形与图案研究专业，现为南京市民俗博物馆陈列研究部馆员。

叶涛：东岳信仰的在地化探析——台南东岳殿考察札记

起源于山岳崇拜的东岳信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官方正统祭祀与民间神灵崇拜两种不同的信仰传统，东岳信仰的民间传统又因时代变化、地域差异、佛教教因素的介入等缘故，各个庙宇都有其在地化的过程。

东岳信仰自明末传入台湾以来，结合地域文化的特点，适应当地民众信仰的需求，形成了独特的信仰仪式，在台湾民众的信仰文化中独树一帜。台南东岳殿是台湾东岳信仰的起源地，可称作是“全台首庙”。

本文从东岳信仰在地化的角度，结合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对台南东岳殿的历史源流及其现状进行考察，特别关注到台南东岳信仰的仪式在区域民众信仰系统中的独特地位，并从东岳信仰的历史与功能等方面，对台南东岳信仰及其庙祀的价值予以初步探讨。

【作者简介】叶涛，1963 年生于山东省费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余敏先：关于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一、20 世纪以来中国民间文学的尴尬生存状态

（一）尴尬的学科定位；（二）尴尬的课程设置；（三）尴尬的研究队伍。

二、中国民间文学陷入困境的原因解析

(一) 历史的原因: 五四知识分子的这种优越心态自觉或不自觉地导致了民间文学研究对象的狭窄和模糊。首先, 把民间文学的创作主体限定在“劳动人民”这一范围, 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其次, 受阶级意识的影响, “劳动人民”一词被冠以鲜明的政治色彩。

(二) 学科自身的原因: 1、搜集整理的方法不够科学。2、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三、重新界定民间文学

(一) 民间文学概念的重新界定; (二) 民间文学重新界定的理论意义; (三) 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核心

四、机遇与挑战

【作者简介】余敏先, 女, 安徽寿县人。硕士。安徽淮南师范学院中文与传媒系讲师。研究方向: 民俗学与中国民间文学。

张多: 信息社会与现代民俗学发凡

信息技术革命为人类生活带来前所未有之变革, 网络上的日常生活成为现实。现代民俗学研究必然面对信息社会为人类带来的急促“变迁”。民俗事象和民俗主体在信息的世界里同样构成了一个生活的整体。民俗学在研究信息社会的民俗时, 要关注“民”与“俗”关系的重置; 信息时代新民俗的产生与传统民俗社会的转型; 信息社会的生活事实与变革。而要研究这一命题, 就需要先提出信息社会民俗学的概念, 关注它在普通人的经验和意识中如何呈现, 并阐述其基本轮廓。

信息社会的民俗变迁与全球化、城市化、发展、危机等人类社会面临的转变性难题息息相关。信息时代的日常生活决不是现实生活的简单虚拟投影, 因为网络世界本身正在改变着日常生活。技术的发展永远是普通人难以预料的, 信息技术的发展超出了人类文明史的任何经验。民俗在适应这变革的时候, 一方面是发挥自身所长的调试机制, 另一方面还要面对种种挑战。民俗背后那个“意义世界”指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日常”的“意义”也同样会在信息社会生根发芽。变化太快, 经验太少, 这就是面对信息世界的困惑。我们正在经历人类有史以来最急促的一次文化变迁。

【作者简介】张多, 男, 回族, 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 11 级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民俗理论、民间文学。

张虎生 陈映婕: 转经: 身体的救赎之舞

身体是一架复杂的文化机器, 不纯粹是生物性的, 同时也是历史的、文化的、经验的、惯习的和传承的。特定的文化模式对身体自有一套文化定义和管理、运用方式。宗教与身体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宗教不仅强调创设一套系统完整的神性宇宙观, 还重视用身体去实践教义与教规, 从而达到宗教式灵与肉的契合。在西藏社会传统的宗教体制下, 藏传佛教并不十分要求西藏的广大普通民众对教义持有深刻而全面的认知, 只强调出于一个极度简化的宗教诉求, 去执行极度简化的身体实践, 并且用人生最大化的时间反复进行操演。西藏的广大转经人对身体的宗教式运用, 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都达到了一种极高的水平。他们以身体和行为展演为核心的日常宗教实践, 都是用局部或全部的身体, 严格操演着特定的宗教规范和治疗仪式, 从而达到人和神之间的沟通。

【作者简介】张虎生, 西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院教授委员会委员, 历史学(藏族史)硕士, 法学(民俗学)博士, 艺术学(戏剧戏曲学)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历史、西藏文化、民

俗学等。陈映婕，浙江师范大学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民俗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民俗学、藏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张金荣：试论清明传统文化在城市空间中的消解、变异和传承

——以北京地区清明节习俗为例

清明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俗流传已久，深入人心。但是在现代城市空间中，清明节俗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城市，作为周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带，较之乡村，它自身新陈代谢的速度较快，民俗活动本来就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北京作为祖国的首都，现代化的变迁日新月异，生存环境的改变，国家政策的干预，参与主体的变化，生活的多样化更是对清明节传统习俗造成很大的冲击，一些传统习俗逐渐消解。清明的节日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地变异，由传统的以血缘为单位，向以地缘、业缘、学缘为单位转化，公众活动的增加，新的表达方式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清明节的内容。在城市空间中，虽然各种主客观条件制约着清明节的传统习俗，使得人们经常在科学与传统的路上徘徊，在政策与情感之间挣扎，持续原有清明节节日行为有了一定的困难，文化变异也在逐渐改变着原来的传统，但是仍然有一条情感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对逝者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感恩，本文将沿着这条主线展开论述，呼吁人们思考生命、感恩生命、热爱生活。

【作者简介】张金荣，女，籍贯：河北，北京联合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社会文化史，指导教师：张勃。

张勇刚：客家古村—江西赣县白鹭民俗田野调查

客家古村白鹭位于江西赣南地区赣县，是一座保存较完整的江西客家古民居村落，民俗文化极其丰富。

【作者简介】张勇刚，男，1978年生，汉族，安徽庐江人，现为赣南师范学院民俗研究生，曾在农村中学任教多年。

朱以青：文化生态学语境下的文化多样性

文化生态、文化多样性问题的提出，是传统文化在危机中寻求保护的一种内在诉求。人类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多姿多彩的文化，但 20 世纪末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带来了文化的同质化。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化、地方文化面临生存危机，文化差异减小，文化趋同加剧，文化多样性锐减，文化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在新千年到来的 200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3 年又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 年通过了《保护文化多样性国际公约》。文化多样性由此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有关文化多样性研究及实践中，无论是学术研究者、政策制定者，还是实际工作者都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生态环境不但塑造了人类不同的体质，也塑造了人类不同的文化模式，由此形成了人类多元的文化。犹如生物多样性之于自然界，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文

化生态平衡、对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多样性文化是文化生态系统生命力的体现，是文化生态平衡的保障。对此问题的关注表明人类已开始反思原有发展模式，为了人类的普世价值，尊重他者文化，尊重文化差异，保护各种面临消亡的民族文化、地方文化，以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维护文化生态平衡。

【作者简介】朱以青，1987 年硕士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后在山东大学从事教学及编辑出版工作。

蒙文论文 存目

席·哈斯巴特尔：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教授、博士

《胡尔奇布仁巴雅尔说唱的〈胡仁·乌力格尔达那巴拉〉的创新性》

哈斯其木格：赤峰学院蒙古文化历史学院，教授、博士

《蒙古民歌与民俗学的关系》

铁安：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副教授、博士，

《科尔沁乡土传说中体现出的生态观》

毕力棍达来：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副教授、博士，

《关于史诗〈江格尔〉〈总论〉中的“三”数》

阿·赛音吉日嘎拉：鄂尔多斯市额托克前旗民政局局长、祝颂文化代表性传承

人

《鄂尔多斯祝颂词的几点特征》

何·赛音朝克图：赤峰学院蒙古文化历史学院，副教授

《关于蒙古族饮食禁忌的多维度考察》

萨义：赤峰学院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关于蒙古民俗搜集与研究中的几点思考》

八宝：赤峰学院蒙古文化历史学院，博士

《萨满诗歌的演唱习俗》

阿民布赫：赤峰学院蒙古文化历史学院，教授

《蒙古族祭火习俗》